

试论民族地区发展面临的非制度因素挑战

陈发扬¹, 吴洁²

(1.塔里木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 阿拉尔 843300;2.新疆财经大学 马列部,乌鲁木齐 830012)

摘要: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分析后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多与少数民族群众的生产习惯、宗教信仰、教育观念等非制度因素有关。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发挥企业家维护生态平衡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少数民族群众作为当地发展的主力军作用。

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非制度因素

中图分类号:D633.1;F12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2X(2014)01-0009-06

少数民族地区是指我国各少数民族聚居、生产、生活的地区。发展指事物在规模、结构、程度、性质等方面发生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旧质到新质的变化过程。就人类社会而言发展则指“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结构、体制的演进和变革,特别是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和变迁。”^[1]故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指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结构、体制的演进和变革,尤其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和变迁。目前,学界认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中的问题主要有: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与民族间的发展差距同时并存,城乡发展差距与民族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国家经济建设与移民社会事业问题同时并存,各民族友好交往与局部的不稳定因素同时并存,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仍需加强、社会公共事业需求的迫切性与供给的短缺性同时并存,基本公共服务事业均等化问题亟待改善、自然资源的富集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同时并存,公平分配自然资源刻不容缓、“当家作主型人才”的相对过剩和“发家致富型人才”的相对短缺同时并存,生态环境的治理与恶化同时并存,生态保护极其艰难、基础设施的落后性与经济发展的快速性同时并存。^[2]这些问题的存在有其特殊的原因,也是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中需要面临的挑战。

一、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成因

(一) 政治因素

第一,目前各民族团结合作是主流,但影响民族团结的因素依然存在,如国外反华势力、国内外“三股势力”、“藏独势力”的渗透、中亚各国的民族主义等给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从而影响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2008年3月发生在西藏的打砸抢杀烧暴力犯罪事件,2008年8月发生的喀什袭击警察案、库车爆炸案,2009年7月发生在新疆乌鲁木齐的“7.5事件”,2011年发生在和田的袭击派出所事件、喀什袭击群众案,2012年6月发生的和田劫机事件,均表明国外反华势力与国内外“三股势力”、“藏独势力”的狼狈为奸、相互勾结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形成了巨大威胁,严重影响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中亚各国的民族主义如“大哈萨克主义”也引起了我国部分地区的哈萨克族“回归”到哈萨克斯坦,加剧了社会动荡。

第二,城乡基层民主发展滞后未能调动少数民族群众发展的积极性。总体来看,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虽有了一些进步,但闭塞的环境,封建等级观念,习俗、宗教、家族观念的影响等因素导致少数民族干部群众民主观念淡漠,民主参与意识不足,加上少数民族地区

收稿日期:2013-09-23

作者简介:陈发扬(1972-),男,四川蓬安人,塔里木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历史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

经济不发达、交通落后,基层民主制度建设资金缺乏;基层党组织对村委会的领导方式不适应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的需要,相关法律制度、选举制度不健全或未落实等因素的存在阻碍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民主制度建设,故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层民主制度建设远未达到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民主制度建设提出的要求。尤其是在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群众进行民主管理的制度还未建立或不健全,村党支部与村委会、乡镇领导与村干部的关系没理顺,村委会的职能未能充分发挥。

第三,政府部分官员执政理念的落后、政绩观的异化、为人民服务理念的缺失等都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二) 经济因素

首先,尽管党和国家近年来加大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投入力度,但发展资金不足仍是经济增长乏力的重要因素。^[3]其次,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升级矛盾重重,阻碍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高资源消耗、外源推动的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资源开发中的利益分享和补偿问题、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返贫率高。^[4]最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低下导致交通落后、信息闭塞,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

(三) 文化因素

落后的科学文化教育、保守的思想观念、消极的传统心理和落后的生活习俗导致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素质低下,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保守的思想观念、消极的传统心理导致少数民族群众对子女的教育不重视,而教育资源如教师待遇的低下、环境的恶劣、现有教师的培训缺乏导致双语教师的缺乏和师资力量的不稳定更加影响了少数民族群众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而中小学数量不足导致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适龄青少年不能就近上学,也影响了少数民族素质的提高,从而影响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

(四) 科技因素

教育的落后、资金的缺乏等导致少数民族地区科技人才培养难度大,且环境的恶劣、闭塞的交通、待遇的低下不能筑巢引凤,人才引进难度大,而现有各类人才因闭塞的交通、资金的缺乏等因素进行培训、进修、学历提升的机会也不多,这就导致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陷入人才不足的困境。人是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关键因素,而科技人才的缺乏已严重影响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

(五) 法律因素

目前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日新月异,各种问题不断出现。如何健全法律法规制度为少数民族地区

发展保驾护航已成急待解决的问题。如何建构有利于民族自治地方的权力配置机制、资源开发利益分配机制、产业结构调整机制、文化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区域协作与利益分配机制则成为法学界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5]除此之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环境日益恶化已成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制约因素,这也要求从法律方面为企业既重视经济利益又重视包括环境保护等内容在内的社会效益提供制度保障。

(六) 地理环境因素

地理环境因素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影响有两个方面:第一,少数民族地区存在区位优势。区位优势导致少数民族地区远离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形成了封闭的社会特征,进而影响了该地区的市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第二,少数民族地区自然环境较差,生态环境非常脆弱,水土流失、荒漠化现象严重,目前的生产方式又在不断加剧生态环境的恶化^[6],进而影响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

上述这些原因与人们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思想观念等非制度因素的影响有关。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盈利和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它包括:“(1)以规则和管制(Rules and Regulations)对行为施加的一系列约束;(2)检验行为是否偏离了规则和管制的一系列程序;(3)一系列的道德和伦理行为规范,它们定义了规则和管制可选择的订立方式和实施方式。”^[7]制度可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安排(Informal Institution)是规则的修改和变动纯粹由个人完成,用不着也不可能由群体完成的制度安排。非正式制度安排包括价值观、伦理规范、道德、习惯、意识形态等。它较之正式制度安排更难以变迁,特别是在社会流动性很小的情况下。而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地处偏远地区,环境闭塞,交通、通讯设施落后,社会流动性相对非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小得多。故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和社会环境、生产生活方式等因素形成的不同价值观、伦理规范、道德、习惯、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制约着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其中某些宗教习俗成为国内外分裂势力进行宗教渗透、破坏社会稳定的工具,落后的教育观念加剧了其文化教育的落后,妨碍了少数民族群众素质的提高,不利于他们学习先进的经济发展观念、改变其落后的发展方式,改善恶劣的生态环境,不利于他们学习各种法律知识,形成“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观念,可见这些非正式制度

因素是制约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根本原因。少数民族地区部分群众的价值观、生产习惯、意识形态、教育观念等与科学发展观不相符,不适应发展的需要,且其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还经常受到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利用,对社会稳定造成较严重影响,从而进一步影响当地发展,这些就是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非制度因素的挑战。

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非制度因素挑战

(一) 生态环境的恶化

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因某些官员异化的政绩观、企业主的道德缺失、少数民族群众的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生产陋习而恶化。某些官员为捞取政治资本为其升迁铺平道路,盲目提高国内生产总值,引进一些被淘汰且污染严重的生产线,造成了对生态的破坏。除此之外,一些企业主无社会公德,为降低生产成本、追逐高额利润,对废气、废水、废渣未进行无害处理,就任意排放,使少数民族地区生态进一步恶化。而少数民族群众由于无科学发展观意识,为提高收益而过渡利用各种资源,从而破坏了生态平衡。少数民族群众科学发展观意识淡薄,与其不科学发展观有关。以新疆为例,新疆有十个民族的成员皆信仰伊斯兰教,故伊斯兰教的发展观对其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此发展观认为世界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但这一规律是神意的体现”。^[8]一切皆“先定”的发展观使其觉得万事万物的发展已经由“真主”安排好,无法改变,从而影响了他们对学习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性的认识,影响了他们学习科学发展观的积极性。

(二) 人才资源的匮乏

人才培养具有长周期的特点。这表明如果领导者无长远的人才培养意识和规划,势必造成人才断层。目前少数民族地区“发家致富型”人才匮乏便与此有关。自西部大开发以来,国家以派遣中青年干部到西部地区挂职锻炼等形式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进行人才“输血”,促进了当地发展。但这也使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领导人只重视人才“输血”效益,忽略人才“造血”功能的形成,导致不输入人才,出现了人才进步匮乏的局面。

除领导者的人才培养意识缺乏外,民众的教育观、妇女观、经济价值观的不同也影响到少数民族地区人才培养。教育观决定教育目的和内容。以新疆信仰伊斯兰教的民众为例,伊斯兰教的教育目标是“培养这个世界的管理者和建设者”,使人们“成为真主在大地上的‘代治者’”。^[9]而不是根据社

会经济发展培养各种专门人才。教育目标决定教育内容。伊斯兰教教育内容也包括德、智、体等方面,但具体内容不同。就智育而言,伊斯兰教鼓励穆斯林学习“实用的知识和学问”,“哲学家伊本西纳强调:‘儿童学完《古兰经》并奠定阿拉伯文基础后,他们所受的教育应该集中于将来的职业’”。在真主“前定”发展观和伊斯兰教教育目的的影响下,将来不凭科学发展观和汉语知识等来求职的少数民族群众就会认为这些知识对其“无用”,故对科学发展观、汉语知识等的学习不感兴趣。这影响了他们了解、学习众多的汉语版的科学技术著作,从而影响了其能力的提高,导致少数民族地区人才不足。在对“你认为提高个人生活水平主要靠什么”时,仅“35.8%的人认为‘靠科学技术’”,这表明新疆的大部分少数民族群众还没认识到教育对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速度、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生活水平的要重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少数民族群众自己的学习观念和对子女的教育理念,不利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人才的培养。

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的伊斯兰传统文化中的重男轻女的妇女观导致轻视女性教育,妇女文化水平低,女性文盲率居高不下。例如,在保安族群众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重男轻女的思想严重,对女子的现代文化知识教育不够重视。他们愿意送子弟入清真寺学经,以便将来能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及经济实惠,初中以上的教育几乎是属于男孩的专利;至于女孩子,“读太多的书没有必要,终究是要嫁人的”思想在家长中普遍盛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保安族女童的辍学率很高,以致保安族妇女文盲率居高不下。^[10]除保安族外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也存在着轻视女子教育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人才培养,造成人才不足。

少数民族群众的经济价值观也对提高其素质有影响,导致当地人才素质不高或缺乏。对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群众经济生活中价值观念的调查表明,仅有51%的人认为把钱花在提高自身素质上最值得。^[11]这说明有49%的少数民族群众认为最值得花钱的非提高自身素质,表明其对自身素质提高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这不利于少数民族群众素质的提高,导致少数民族地区人才不足。

(三) 局部地区不稳定因素的增多

目前我国局部少数民族地区影响政治稳定的因素增多。其突出表现是十四世达赖利用其宗教影响宣扬西藏独立,新疆的“三股势力”利用伊斯兰教的影响向少数民族民众宣扬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疆独”、“藏独”等分裂势力往往把一些普通的社会问题说成是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一些不

明真相的少数民族群众因同族同教而对其披着宗教外衣的反动言行深信不疑,为“疆独”、“藏独”势力的分裂活动提供方便,甚至导致部分少数民族群众直接参与一些分裂祖国的活动。为何如此?因为佛教、伊斯兰教作为西藏和新疆的意识形态之一是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关于世界的一整套信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这两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的意识形态和行为,而“疆独”、“藏独”等分裂分子又往往把自己装扮成某个民族利益、某种宗教信仰利益的捍卫者,故其反动言行对少数民族群众的蛊惑作用就明显增强。而就少数民族群众自身而言,一方面绝大部分群众认为社会稳定很重要,但对新疆的少数民族群众调查表明仍有1.85%的人认为“不重要”,4.62%的人表示“无所谓”或“不知道”,且认为“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来自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这一论断“符合自治区实际”或“基本符合自治区实际”的占81.96,而表示“不符合自治区实际”或“不知道”的占18.04%,表明一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对“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认识不清。^[12]另一方面对西北地区各少数民族的法律教育价值的调查表明有愿意或比较愿意接受普法教育的人占82.3,这表明有17.7%的少数民族群众不认同法律教育价值;仅有52.6%的少数民族群众在受到伤害时会通过法律解决,而不知怎么办、寻机报复、向报社等媒体投诉等非法途径占了47.4%。这表明西北地区各少数民族群众对法律正义价值的认识程度还比较低。不认同法律教育价值、对法律正义价值的认识程度还比较低,表明法治价值观的异化也可增加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四) 传统发展理念的束缚

首先,对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群众的消费观念调查表明有45.6%的人认为不会向银行贷款消费。这会一方面造成少数民族地区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利用,就会影响当地各行业生产发展壮大,导致员工需求减少,使就业压力增大,从而影响当地发展,另一方面,也会影响少数民族地区金融业贷款业务的拓展,难以为其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保障。

其次,对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群众的消费观念调查表明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对社会存在收入差距合理性这一观点认同的仅占48%,认为其不合理的占34.3%,持模棱两可的态度的有17.6%。^[13]这说明有较多的少数民族群众对我国实行的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不认同、不理解,一方面这会打消一些少数民族群众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会影响少数

民族地区调动所有的生产要素如资金、技术、土地等来促进发展。

三、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面临的非制度因素挑战的演变趋势

目前非制度化因素对少数民族地区局部的不稳定、生态环境的恶化、人才缺乏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且影响范围较大。又因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流动性较小,宗教观念、道德传统、发展观、教育观等非制度化因素较之正式制度安排更难以变迁。尤其是宗教观念的影响与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结合给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威胁。如新疆的宗教极端势力组织“伊扎布特”、“台比力克”等在宗教信仰的掩护下通过地下经文学校向少数民族群众极力宣扬民族分裂,鼓动民族仇视,破坏民族团结,从事种种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以十四世达赖为首的藏独势力利用藏族群众对藏传佛教的虔诚信仰来煽动少数民族群众搞西藏独立活动,给西藏社会稳定带来了极大威胁,影响了西藏发展。且这些宗教观念与当地的贫困问题、暴力犯罪、民族问题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其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更难以消除,使当地发展面临的挑战和困难更大。而教育观念的落后与少数民族地区环境的恶劣、教育基础设施的落后、就业压力大和贫穷等因素交互影响会严重影响当地青少年的教育,会严重制约当地群众素质的提高,导致当地发展缺乏人才。

四、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应对非制度因素挑战的措施

(一) 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1) 大力宣扬主流意识形态,占领思想文化的主阵地。

主流意识形态是指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宗教、法律、道德伦理等思想,它对于现存的制度结构具有明显的确定和认可其合理的作用。它决定着非主流意识形态及个人的意识形态是否合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是指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党和政府要通过广播、电视等多种宣传媒体和手段来加强文化建设,为少数民族地区居民提供急需的公共文化产品,使其通过这些公共文化产品去了解、学习、践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从而改变传统宗教观念、落后的生产观念和教育观念,并削弱这些观念对他们的影响。

(2) 建立合理、全面的官员政绩评价机制。

目前许多官员只顾提高自己辖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其原因是能否通过提高国内生产总值影响

其仕途。这是由官员政绩评价标准过于简单化、过度看重国内生产总值这一指标导致的。因此,今后对官员政绩的考核要全面,衡量指标要多样,既要考虑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注重经济发展指标,又要考虑人民生活水平是否提高,人民的幸福感是否增强,医疗条件是否得到改善等人的发展指标,还要考虑人民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是否妥善解决,人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是否提高,参与能力是否增强,人民的民主权利是否得到维护、实现等政治发展指标及环境是否得到改善,生态是否得到维护等环境改善指标。唯此才能消除不良的政绩观对少数民族地区官员的消极影响。

(3) 建立对造成环境污染、引起生态恶化的企业的临督、惩处机制。

目前一些企业之所以唯利是图,只顾提高利润,不顾社会利益,肆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主要是国家相关部门对其违法行为未进行有效监督,未对其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惩处,使他们未意识到造成环境污染、引起生态恶化将付出沉重代价,将会给企业带来巨大损失。故有关部门应加大对企业环境效益的监督,对那些造成环境污染、引起生态恶化、不顾社会利益的企业不仅要进行严厉惩处,让其限期整改,还要通过各种媒体对其进行曝光,让消费者通过“用脚投票”对其产品说“不”,使其意识到一旦造成环境污染将会给企业的生存带来极大困难甚至是毁灭性打击的严重后果。除此之外,政府相关部门还可通过从技术、资金等方面为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减少环境污染提供方便或以优惠的税收政策对其减少环境污染给予鼓励。这样通过有效的监督、严厉的惩处、适当的鼓励完全可使那些企业主的社会公德感、社会责任感增强,做到提高企业利润和维护生态平衡兼顾。

(4) 树立长远的人才培养观念,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培养专门人才。

在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大力度的人力支持的同时,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级官员应抛弃有了这些“博士服务团”、挂职干部等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中的人才不足问题就可得到彻底解决,从而高枕无忧,忽视人才培养的错误观念和做法。因为这些“博士服务团”、挂职干部中的绝大部分在一段时期后都要离开少数民族地区。且人才培养不能一蹴而就。一旦他们离去了,靠谁来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呢?难道一直靠党和国家的人才“救济”吗?可见树立长远的人才培养观念、根据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制订中长期人才培养规划并付诸实施对保证少数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是相当重要的。除此之外,还要制定一些措施对

培养出来又回到少数民族地区为当地发展而工作的人进行奖励,这样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中的人才匮乏问题才会逐步得到解决。

(5) 关心少数民族群众疾苦,提高其生活水平。

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如果基本生活无法保障,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动用一切手段去谋生,于是去偷、去抢、去骗就成为一种选择,从而导致治安案件频发,影响社会稳定。且少数民族群众的疾苦得不到关心,诉求得不到解决,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民主权利得不到维护,就会给西方反华势力以可乘之机来攻击我国的人权,来挑拨少数民族群众同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关系,就会给西藏的“藏独”分子、新疆的“三股势力”以利诱少数民族群众参与其分裂活动提供方便和可乘之机。在给民族关系带来巨大负面影响,给西藏、新疆社会稳定带来极其恶劣影响的“3.14”、“7.5”打、砸、抢、杀、烧暴力犯罪事件中,有许多不明真相的少数民族群众就曾经被分裂分子利用并对事件发生、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旦少数民族群众的疾苦得到了切实的关切,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而人都是有感情的,他们定会 will 将分裂行为的危害与党和国家的政策给他们带来的实惠进行对比,然后做出正确的选择,主动反对分裂分子的分裂图谋,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 发挥企业家维护生态平衡的主观能动性

目前少数民族地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越来越严重,其原因是企业唯利是图,无社会责任感,无社会公德。而这与企业家有很大关系。因为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的实质是企业的核心理念。而企业的核心理念又是由企业家的理念转变而来的,故企业家是企业的核心,企业家的决策决定着一个企业的发展方向和命运。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必定有优秀企业的核心理念,必定会将企业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必定会将企业利润的提高与周边生态的维护结合起来,相反一个平庸、目光短浅的企业家则会为提高企业利润而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故提高企业家的各种素质,培养其社会公德意识,转变其经营企业的理念,形成企业发展与整个社会发展密不可分的发展观念,充分发挥企业家维护生态平衡的主观能动性是很重要的。

(三) 发挥少数民族群众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主力军作用

非制度因素消极作用的消除除了要发挥党和政府的主导作用和企业家的主观能动性以外,还要充分发挥少数民族群众的主力军作用,因为人

民群众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其一举一动关系着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故发挥少数民族群众的主力军作用，使其主动抛弃落后的生产观、教育观，积极学习各种科学文化知识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认识到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性，认识到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树立自主学习、创新学习、全面学习、终身学习观念的重要性，从而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用自己的才华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服务，认识到子女教育与培养的重要性，从而为子女的教育提供各方面的支持，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培养更多的合格建设者而做出其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 庞之正,丁冬红.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新词典[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 [2] 才让加,贾东海.“十一五”期间少数民族事业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和挑战[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2,(3):11.
- [3] 刘庸.少数民族地区划经济发展的九大制约因素[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3,(2):58.
- [4] 郑长德.西部大开发以来少数民族地区划的经济发展与未来

- 展望[J].民族学刊,2010,(1):70.
- [5] 田钊平.民族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根本问题[J].三峡论坛,2010,(5):98.
- [6] 孙庆刚,秦放鸣.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划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影响因素[J].经济问题探索,2010,(4):189.
- [7] 埃瑞克·G·菲吕博顿.新制度经济学[M].鲁道夫·瑞切特,孙经纬,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 [8] 孙振玉.中国伊斯兰文化研究[M].甘肃:甘肃民族出版社,2008.
- [9] 马明良.伊斯兰文化新论[M].宁夏: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 [10] 马克林.伊斯兰教妇女观对西北穆斯林女性的影响[J].宁夏社会科学,2007,(5):74-75.
- [11] 赵德兴,等.社会转型期限西北少数民族居民价值观的嬗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 [12] 姚维,马岳勇,等.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心态与少数民族地区划发展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5.
- [13] 赵德兴,等.社会转型期限西北少数民族居民价值观的嬗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宋祥军】

The Research of the Non-system Factors Challenge and the Measures of the Development in the National Minority District

CHEN Fa-yang¹, WU Jie²

(1.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Tarim University, Alar 843300, Xinjiang,China ;2. Xin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Urumqi 830012,Xinjiang,China)

Abstract: After analysing all kinds of problems during the development in the national minority district the paper thought these problems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non-system factors such as production habits, religions ideas, education ideas, and so on. On the basis of that it suggested that we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the governments leading, arouse the enthusiasm of the enterprisers and make the minority people play a main role during the development in the national minority district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The national minority district; Development ;Non-system factors